

# 信仰的力量

黃鳳祝

## 挪威爆炸和槍擊事件背後

七月二十二日，在素有「最和平的國家」之稱的挪威，近百個生命，頃刻葬生在一个叫布雷維克的男子槍下。事後布雷維克承認自己的行為「殘暴但必要」。本文試論述其心理和行為。

布雷維克 (Anders Breivik)，三十二歲，一個信仰基督教的普通挪威人，「七二二」挪威恐怖襲擊的實施者。把當代歐洲的基督教徒與恐怖分子劃上等號，是許多歐洲人不願接受的事實。人們更希望布雷維克是個瘋子。唯有如此，他的行為才可以獲得「更為合理」的解釋。

布雷維克自二〇〇六年開始撰寫《二〇八三——歐洲獨立宣言》(2083 - 4 European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着手策劃恐怖襲擊。在這份宣言中，他對自己的信仰與理念作出了明確的闡釋。布雷維克的行動理論主要來自《聖經》和密爾 (John Stuart Mill) 的學說，植根於歐洲文化傳統，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和真理的唯一性，認同目的聖化手段。這種理念深藏於《聖經》之中。

### 信仰的力量大於物質利益

信仰是一種社會力量，它往往大於物質利益帶來的政治動力。布雷維克認同密

爾的學說。他在自白中寫道，自己的所作所為皆為信仰使然。二〇一一年七月十七日，在實施恐怖襲擊之前五天，布雷維克在推特 (Twitter) 上發表了一段文字：「一個有信仰的人，其力量等同於十萬個僅僅為爭取利益的人。」(One person with a belief is equal to the force of 100,000 who have only interests.) 這段文字引自密爾《代議制政府》(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一書的第一章，與原文略有出入。密爾的原文為：「一個有信仰的人和九十九個僅僅為爭取利益的人是同等的社會力量。」(One person with a belief, is a social power to ninety-nine who have only interests.)

密爾認為在政治學上存在着兩種對立的學說。一種學說主張政治制度 (政府) 是實現人的目的的一種手段。人為了達到目的，有選擇最佳手段 (製作自己手段) 的權力，即選擇最適合自己的政治形式，得以最大限度實現自己的目的。為此，首

先需要明確政府追求的目標；其次是考慮採用何種政府形式，最有助於實現這一目標。在確定能獲得最大好處和最小壞處的政府形式之後，接下來需要做的是爭取國人認同自己的意見，即勸說國民「相信」這是最好的政府形式，並鼓勵他們堅持這種制度。另一種學說，主張政府形式是歷史發展的一種必然，政府形式不是選擇的問題，人們必須接受事實，適應現實制度。密爾認為這兩種政治學說既有對立，又有互補。政治制度的創立有賴於人的「意志」，其存在的每一個階段都是意志的結果。政治形式必須得到國民的認同和接受。

### 必要時可使用暴力排除障礙

密爾強調信仰的力量，同時認同暴力的必要性。社會的精神力量，有時遠比經濟力量和物質力量強大。他指出，黑奴制度在英國和世界其他地區的終結，不是依靠物質利益和分配制度的改變，而是基於

道德信念的傳播，俄國農奴制度的解體也是如此。道德信念需要一個好的政治制度來維護，宣揚和規範其他民族的價值觀，有時也需要使用暴力。密爾認為，為了貫徹良好的文明和價值觀念，必須確立一個好的政治形式。必要時，甚至可以使用暴力來排除障礙。他引用歷史事件來證明暴力的必要性：「只有外來的暴力才能勸使一個北美印第安人部落服從正規的文明政府的限制。對蹂躪羅馬帝國的野蠻人也可以這麼說，儘管不那麼絕對。」對於一個未開化的民族，在某種程度上感受到文明的好處，但是在感情上，卻往往不能接受，因而無法履行應盡的義務。密爾認為，為了引進最好的政治制度，對無能力或不願接受最好政府形式的人或民族，必須實行專制統治。

引進最好的制度是一個意志的問題，所有的政治力量均來自意志，而意志來自信仰。密爾認為信念是形成力量的主要因素。信念比物質利益更重要。如果能夠成功形成一種普遍的信念，即認為某種政治形式值得選擇，就可以整合一定的社會力量。密爾由此指出：「一個有信仰的人和九十九個僅僅為爭取利益的人是同等的社會力量。」

密爾嘗試用《聖經》來證明自己的理論。基督教的第一個殉教者史提芬，在耶路撒冷被反基督的人用石塊打死，他的信念感化了保羅。保羅原是基督的反對者，

受到史提芬信仰的震撼，改信基督，成為羅馬教會的奠基者。布雷維克也試圖成為一名殉教者，以此來喚醒民眾。對異教徒使用暴力的理念，源自《聖經》。耶穌和他的門徒身受猶太教暴力之害，依然主張以愛心來感化敵人。但是信仰耶穌的基督教會，並沒有發揚這一精神，在《新約·啓示錄》中，如《舊約》一樣，大力宣揚用暴力懲罰異教徒。

### 向文化馬克思主義宣戰

在布雷維克看來，伊斯蘭教徒自十四世紀開始向歐洲擴張，試圖摧毀歐洲及其原住民。一六八三年，與法國結為同盟的土耳其人包圍了維也納。在波蘭、威尼斯共和國和德意志諸國的幫助下，奧地利最終得以擊退土耳其。布雷維克把這一年視為歐洲與伊斯蘭戰爭的起點。他預言說，這場反伊斯蘭化的戰爭將持續四百年，直至二〇八三年把穆斯林全部趕出歐洲，歐洲獲得勝利。他因此把自己的宣言命名為《二〇八三——歐洲獨立宣言》。他把自己的行動計劃視為一種先驅，一種犧牲，目的在於喚醒歐洲人，不要沉迷於文化馬克思主義和文化多元論，團結奮起，共同驅逐伊斯蘭教徒，保持歐洲的純潔。

他在宣言中聲稱自己是「聖殿騎士」，代表自由的歐洲人，為了捍衛歐洲文化的純潔，向西歐的文化馬克思主義和多元文化主義集團宣戰。宣言宣稱：「對

話協商的時代已經終結，我們曾經給和平一個機會，現在，武裝反抗的時代已經到來。」布雷維克仇視穆斯林，但是他發動的「戰爭」所針對的對象，並不是伊斯蘭教徒或外國移民，而是挪威社會民主黨的支持者。布雷維克認為，要徹底解決歐洲的問題，必須從清理本國的政治理念着手，而非從外國移民入手，首要的是肅清本國的文化馬克思主義者，挪威社會民主黨就是文化馬克思主義的代言人。布雷維克認為，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是文化馬克思主義的根源。在於特島 (Utoya) 參加挪威社會民主黨青年團活動的年輕人，是社會民主黨未來的接班人，是文化馬克思主義和多元文化主義未來的代言人。消滅這些青年引起的震撼，可以起到殺雞儆猴的作用。

在與全球化相伴的諸多社會問題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自我價值的流失。全球化引發大規模的文化碰撞和文化融合，多種文化價值受到衝擊甚至遭到毀滅。信仰這種文化價值的人，由此失去自我認同的依據，喪失了自我。徘徊在失落自我的邊緣，總有一些人，為了維護自我的存在，試圖從鳳凰涅槃中，即毀滅中，謀求重生，營建不朽的價值理念。「九一一」恐怖襲擊的參與者是如此，「七二二」事件也是如此。

（作者是上海同濟大學歐洲文化研究院教授。）